

试论文科科研基地建设的学术指归

栾 栋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要 文科科研基地是中华民族抵御国际文化沙尘暴的试验田,也是克服上个世纪以来国人心气浮躁和文化裂变的重要举措。学术与学人的关系是文科基地建设的重要环节。“学术解”剖析学术根器;“质地”探究学术本色;“品鉴论”讨论学术品位;“会通观”关注学术焦点;“功夫论”阐发学术节奏;“缘心释”梳理学术间隙。基地教研三要求和学人三境界指向一个可能的目标 欲栽大树擎苍天。

关键词 文科科研基地 学术 质地 品鉴 会通 功夫 缘心

中图分类号:G311;G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1)03-0095-03

近年来 教育部启动了文科科研基地建设的计划,这是我国文教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文科研究和人才培养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全国有不少专家为基地的设置殚精竭虑,首批获选的文科基地也有大批的学者尽心尽力,局面可喜可贺。本文从学术和学人发展的内在关系上着眼,对文科科研基地建设的学术指归问题谈一点个人的见解,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文科科研基地的学术目的在于人才培养。文化战略规划,人员财力调配,重大课题攻关,科研水准提升……所有基地的任务都可以还原成一个环节:学术与学人的关系问题。学术何物?学人何为?以下从六个方面爬梳剔抉,入之出之,聊作门边杂谈。

一、本真与方略。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学术解”,即对学术的理解。文科科研基地的核心工作是发展学术事业。学术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人文本真和学科方略的集合体。人文本真在于学,学科方略在于术。学术二字虽然连用而不分,实际上却是合中有分的文化现象。人文本真执着于内在之学,求道重德概括了学之内涵;社会功利看好的是可解之术,制器谋算披露出术之要略。文科科研基地是学术重镇,执术抑或为学成了价值取向的关键。人们追求的最佳状态当然是学—术兼美、道—器尽善,但实际上往往是术先而学后、道末而器前,实质性的本真精神委顿于俗务,方略性的工具理性占尽了先机。科学主义、量化机制、商品运作、梯队设置、编辑科研、集团风气……诸如此类的趋向都是文科科研基地无法回避的现实状况。其中固然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凸显出的机理主要是术而不是学,是内在的器化倾向(机制化)和外在的多种要求

收稿日期 2001-03-19

作者简介 栾栋(1953-)男 陕西子长人 法国巴黎索邦第一大学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万方数据

(功利化)的不谋而合。我们并非一味反对学术机制化和功利化,谁都知道逆势思维不合时宜且有片面之嫌,这里关心的是学术本真的淡化和学术品位的流失问题,有术无学或术高学浅成了文教事业的心腹之患,当然也是我们文科科研基地建设的一大难题。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古以道化学和“学而”入道都是可资借鉴的经验,西方20世纪返本求源的人文思潮也不乏错玉之石。我们的各级决策部门倘能“参古定法,望今制奇”,一定会抓住权衡本末的要领。每个学者倘能原道知道体道明道,也可以找到补偏救弊的关捩。

二、数量与质地。此处要强调的是“质地说”。现代化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一个快字。所谓数码化便是该特点的明显标志。重数量还是看质地成了一个社会的品质问题,当然也是事关文科科研基地建设的本真问题。当一个社会进入快速大量产销的一刀切机制之日,一定也是其异化到麻木不仁甚至病入膏肓的状态。当一个学术机构也向快速大量产销靠拢之际,一定是其粗制滥作或斯文扫地之时。在学术领域里,著作等身决非好事。目前实行的学术量化标准虽然有不得已而行之的原因,但是从本质上讲,实在是弊大于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取败之道。学者的升等看数量,看发表论文的档次,这在一个快速产销无物不商品的时代,无异于科研的机械化和学术的快性自杀。博导的年龄越来越轻,退休年龄越来越早,这实际上与人文学术背道而驰。人文学科功在涵养修炼,天命、耳顺、遂心所欲不逾矩决非虚言,大批量产销高层次学术带头人等于揠苗助长。人文学科领域的快速新陈代谢不啻弃大树而用嫩材。这既有背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才成长的自然节奏。我这样讲,并不是一揽子指责现行的人事制度,而是想说明,教授的价值在长寿,人文学科更是如此。有关方面应对特殊人才实行特殊政策,对已退休者也应大力关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文科科研基地是国家人文教研的试点,在重质地重品位的问题上理应为天下人树立表率,应提倡质地至上的原则。我们都熟悉的一个提法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在人文学科领域被“快”字逼仄的特殊时代,必须强调质地优先的原则。质地与质量不同。质量虽然以质为重,但是毕竟包含了对质的量化。质地纯粹是以资质和品格为基准的要求。它告诉我们:人文成果的根本品评标准是质地化,即以基质论优劣的问题。

三、陶冶与品鉴。简要地说,是由“质地说”生发出新的“品鉴论”。质地化的基准是一个很难为浮躁社会所接受的要求,但是其本真的无目的而合目的性揭示了人文学科的原发性和超越性。“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君子不器(孔子)”;“缘域”论(海德格尔);“他者”说(勒维纳斯);“裂隙”观(德里达)……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尽管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都看到了返朴归真的重要性。我把这种学术大端归结为文明的“退耕”或“还原”。这些理论都是从质地的前提寻找人文的根本标准。由此导出的规范不是量化,不是某种杂志的等级权威,不是当下水涨船高的哄抬喧闹,而是沉潜涵化式的陶冶与品鉴,是质在文先、质在量先的基准性价值,是以质校文、以质较量的根本性把握。陶冶与品鉴既是入道式的修炼和深造,也是扬弃性的淘汰和筛选。这是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切磋,是历史与未来的当下判断。评审活动——不论是具体学术成果还是基地总体评审,应充分考虑道之深浅、德之厚薄、学之虚实、术之表里,应有圆观宏照的眼光和擘肌入里的洞察。除本单位的专家参与之外,还应广泛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或网络的渠道广招评鉴。基地可以设立采评机构,以相当的款项奖赏和酬谢署名、化名或匿名评优评劣的专家学者。

四、专家与通才。专与通的矛盾是目前国际上“T”型人才讨论的重要问题。“一”是指学问的广博;“|”是指专业之精深。西方学术界迄今尚未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

国治学传统中的“会通观”不失为化解此类矛盾的经验良方之一。“会通”是指由点到面的深化过程,即经由局部的融会贯通,逐渐臻于一定规模的博大精深。文科科研基地应以培养高层次的优秀人才为己任,尤其要努力培养通识性的大才。虽然后者未必一定出自这样那样的基地,但是能获批基地的单位大都是高手济济,设施完善,众望所归,且各方面投入较多的高等学府,理应有培养大才通才的自觉意识和切实举措。专才和通才都是相对而言的说法,是针对现代化社会分工过细的局限性而发的。“会通观”是对这种分工状况的补救。专和通相对立而存在,相辅助而开显,相化合而发挥。社会机制对人才的取舍常常是以具体专业需求为首要尺度的,每一个文科科研基地也都是以某一门类见长。专业专才是应社会分工需要而设的培管项目,通才通识则是人文本真的根基性规范,是对社会不合理性的消解和融通。文科科研基地在邀访聘才招生留人以及课题规划等方面都得充分兼顾通识性的考虑,每一个研究者务必在抱负职志定点选题立意命篇诸向度深切地关照解域性的创制。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当今世界强化的就是专才教育。事实上所谓的专才仅仅是社会和教育片面化的集中表现。专才专而不转,条理性的贯穿掩盖了流布脉络的堵塞。一个社会,一个人,机械式的切割只能造就单向度的零件,只能酿成“痛而不通”的社会局面。如果说各种各样有意无意的专才教育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势必如此的两难选择,那么文科科研基地以通才教育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从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今之所谓专业,实际上都是昔之所谓非专业的边缘处派生而来。就人才成长而论,今之所谓专才,往往是从解域中得其穷,在临界处成其大。文科各门类的融通势在必行。文理的渗透也是历史之必然,而这是需要另文加以说明的难题。

五、急功与慢工。与上述“会通观”互为因果的是“功夫论”。快速旋转的社会生产着大批急功近利的人。而人文学科的本质和学术禀性恰恰注定了该领域只有一条正道:“慢工出细活儿”。道德文章相辅相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学术造诣旨近大海,沉潜涵泳旷日持久。而且才胆识力的增长都和文史哲的会通以及人生体悟的深化成正比。如果是培养普通的文化人或一般的教书匠,快也有快的道理。对于承担大才通才培养和重大学术项目的文科科研基地而言,操之过急则适得其反。文科基地应有三个要求:第一是要鼓励研究人员循序渐进地写出好文章;第二是要关照“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设计;第三是要提倡“一本书主义”。前两个层次不难接受,后一种提法容易被人误解。这里说的“一本书主义”,是指一个学者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在学术品位上的严谨态度。老庄孔孟都没有盈案累尺的大部头著作问世,有谁能否认他们是人类的大脑。刘勰留下了一本《文心雕龙》,同时也开创了与日月争辉的“龙学”。提倡“一本书主义”就是推崇“写经”的精神。高层次的学术机制,如文科科研基地和博士点,不可将精力集中在编教材方面,现有的一些好教材足以满足大学教育和一般文化人的需要。高层次学术机构需要创造性的传世之作。国家的科研管理部门应通过课题筛选、出版协调和舆论导向防止重复性的劳动。在写作工具精良的现代化社会,最多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文化产品,最头疼的是充斥各个位置上的文化垃圾,最期盼的是不愧时代不误人子弟的命世之作。要煞住粗俗不堪的编书风,要节制所谓梯队优势的集体课题发放。要看到,从本质上讲,文科科研成果更应该是个性化的创造性劳作。

六、中心与边缘。这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话语权力关系,我主张一种新型的“缘分释”。一般而言,文科科研基地的所在地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其学术力量、配套设施、经济投入、海内外声望大都不同凡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已有的基地确实当得起各领域学术重镇的称号。

(下转第136页)

相比较而言,没有基地的兄弟院校则是边缘。从学术的本真上来理解,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实际上是有话语权的变数。基地是学术制高点,是话语中心,有权利话语,但是未必有话语权。真正的话语权力是“话语圈离”或曰向非权力非中心的让度,是开放藩篱,有容乃大,即“敬重他者”形成“视域融合”的“圆观宏照”。真正的话语权力也是“话语効力”,即“举重効力”的劳动号子,把各种话语的力量汇进来,使学术生命焕发出彪炳史册的光芒。话语的“权力”——“圈离”——“効力”是对“学术公器”说的超越。“公器”说只涉及学术之术,是有待。上述新型的话语权力论则是基地的开放,重在本真的学术之学,是无待。中心与边缘的提法实际上仍然是权力话语的世俗性界说,在学术的本真处是无所谓中心的。以我之见,真正的学者须经历三个境界:其一是话语有质地(有本根,有自重,也可以说有权力,但非权力话语);其二是中心在圈外(突破“围城效应”,“游走于学术边缘”,“向他者超越”);其三是精神跨千载(道德流布,神采葳蕤,“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这三个境界揭示的是向学术极顶攀登的人文深旨,其博大精深的指引,足以令我辈心往神追。一个学者要有一点精神,一个基地更应该有一点精神。这就是一个又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我们不妨从第一点和第二点做起,话语质地与权力互训,中心与边缘互补。至于“文果载心”的问题,实际上是每个学者和每个基地永恒的追求。这就是我所说的“缘心释”。

让我们对上述几个方面做一个小结:“学术解”剖析的是学术根器;“质地”说探究的是学术本色;“品鉴论”讨论的是学术品位;“会通观”关注的是学术焦点;“功夫论”阐发的是学术节奏,“缘心释”梳理的是学术间隙。这六个方面说明的只是一个要点:学术与人才的本质联系。在 20 世纪我们经历了过多的浮躁和文化裂变,本世纪国际文化天地将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我们希望中华民族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类的文化奇迹,培育出一大批洞察国际文化风云的学术大师。文科科研基地是中华民族抵御国际文化沙尘暴的试验田。借问基地何所为,欲栽大树擎苍天!

【责任编辑 林利藩】